



中国历史小丛书

范仲淹

李涵 沈学明

中华书局



中国历史小丛书

范 仲 淹

李涵 沈学明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3/8 印张·18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113 定价: 0.12元

中国历史小丛书

范仲淹

李涵 沈学明

目 录

一、勤奋苦读的青年	1
二、兴利除弊,百折不挠.....	5
三、抵御西夏的帅才	14
四、一次刷新政治的尝试	25
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4

一、勤奋苦读的青年

北宋的时候，在山东中部的长白山（现名白云山，在今邹平以南）北麓，有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小寺庙，叫做醴泉寺。它座落在一片苍翠可爱的松林前，一条清澈的小溪绕山而下，汨汨地从寺旁淌过。溪畔，僧人种的几块菜畦在微风里散发着阵阵菜花的清香，环境十分幽静。这里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早年刻苦攻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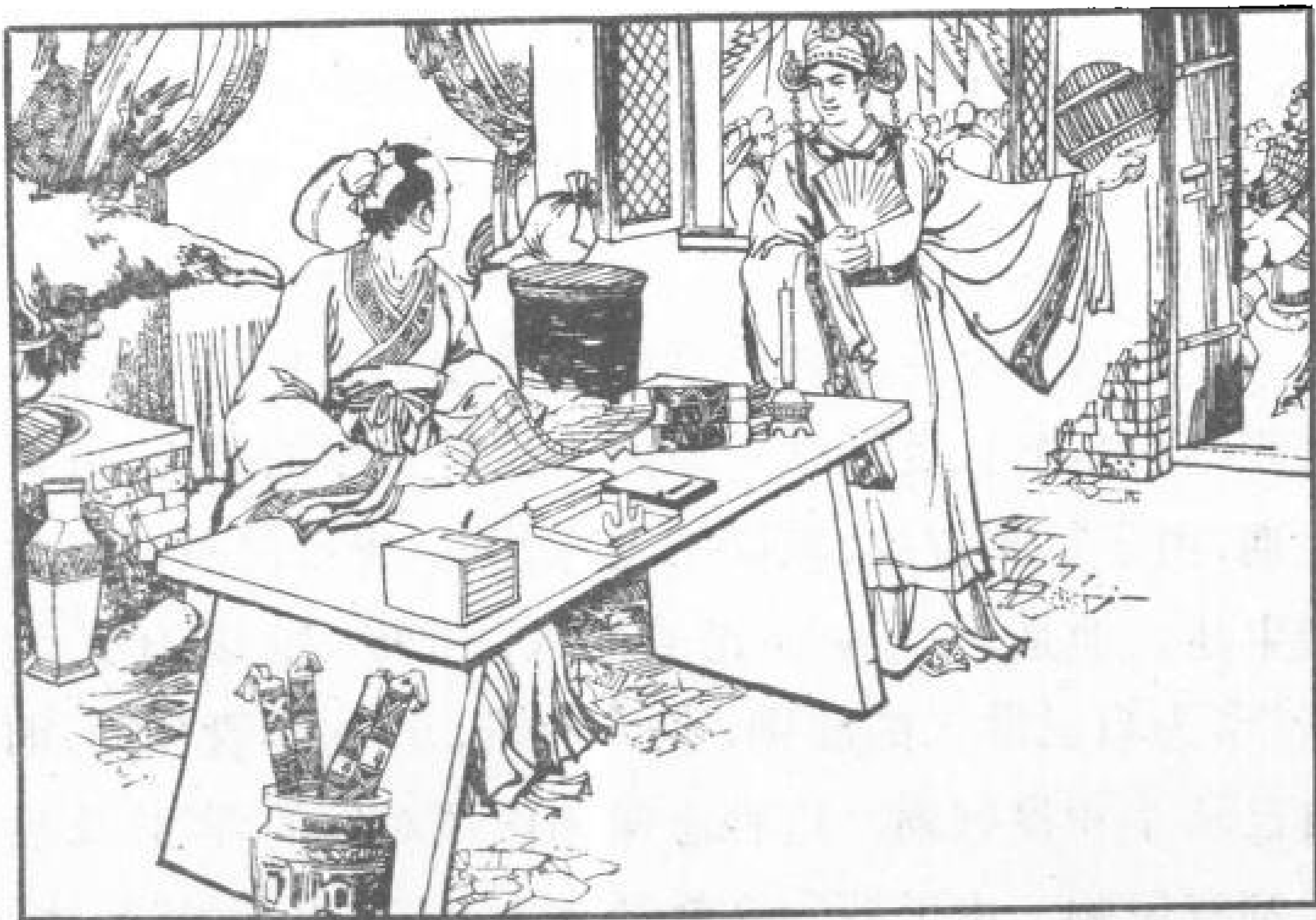
范仲淹字希文，他的祖先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到苏州吴县。他家祖上几代都在吴越王（五代时期南方一个小国的君主，后归顺宋朝）钱氏手下做官。他的父亲范墉，博学能文，曾任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是一个靠微薄官俸为生的官吏。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两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好带着他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yuè悦〕，在朱家长大成人。

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刻苦好学，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1009年),他在醴泉寺读书时,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很贫困,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就算是一顿饭。但是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是用全副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寒来暑往,范仲淹已经在醴泉寺苦读了三个春秋,学业上有很大进步,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总感到这里孤陋寡闻,既得不到有学问的老师指教,也缺乏共同切磋讨论的同学。他渴望着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访师问友,增广见闻,以便将来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来。正在这时,有一件事促成了他的离家求学。原来,范仲淹在朱家虽然受歧视,却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长山的富户,子弟惯于挥霍,范仲淹看不惯他们那种奢侈浪费的作风,曾多次劝止,因此引起朱家兄弟的不满,嘲讽地说:“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惊,觉出话里有话,马上追究盘问,方知自己的家世。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毅然离家往南京(今河南商丘)求学去了。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进入了 he 思慕已久的应天府书院(又称南都学舍)。

南京本叫宋州,因为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发祥地,所以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被升为应天府,不久又被定为南京。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这里正在发展成一个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应天府书院正是在这期间由睢阳学舍扩建而成的。睢阳学舍是前代著名学者戚同文聚徒讲学的地方。五代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戚同文无意仕进,决心终身从事教授生徒。他是一个纯朴正直的人,把“人生以有义为贵”奉为自己做人的准则,见人有难,往往倾囊相助,而自己从不积攒钱财。这种志操和作风对他的学生及后代都有影响。由于戚同文教学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他的弟子通过科举做官的就有五、六十人,许多人不远千里前来求学,聚集了一批有志之士。后来,当地人曹诚在戚同文故居旁盖房百余间,置书数千卷,扩大了睢阳学舍的规模。这一举动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将这所学校改为由应天府直接领导的府学。应天府书院名气越来越大,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因此,当范仲淹入学时,这里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范仲淹顿觉眼界大开,过去缺师少友的苦闷心情一扫而光,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有一次,宋真宗去朝拜亳州(今安徽亳县)的太清宫,路过南京时,整个南京城都轰动了。人



人们争相跑去看皇帝，惟独范仲淹仍旧埋头读书。

们争先恐后跑去看皇帝，惟独范仲淹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是范仲淹只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又继续读他的书了。

自从离家后，范仲淹的生活更困苦了，常常连吃饭的钱都不够，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酒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留守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

说：“我不是不感激你们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就这样，范仲淹在南都学舍“昼夜苦学”，有时夜间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再坚持学习。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五年寒窗苦读，他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

自幼孤贫、受人歧视的身世和青年时代刻苦求学的经历，培养了范仲淹倔强的性格和俭朴的生活作风，也使他对下层社会有了较多的了解，为他入仕后关心民间疾苦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使他初步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

二、兴利除弊，百折不挠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阳春三月，草木萌发，溪水潺潺，野花星星点点地缀满山间溪畔，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在范仲淹眼里，这一年的春意格外浓，因为恰在这时，他考中了进士，不久就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①。他

^① 宋代在县以上设有府、州、军、监一级的行政区划。广德军辖境相当今安徽广德、郎溪县地。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

把母亲接来供养，并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当时，范仲淹只有二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强，很想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负，他满怀豪情地踏上了仕途。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吏。他在任上十分注意体察民间疾苦，一心想为国家兴利除弊，干一番事业，不同于当时官场中那些碌碌无为之辈。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市），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经常受到海潮威胁。唐朝时曾在这三州修过一条捍海堤，但是年久失修，早已颓坏，因此每年秋季海潮泛滥时，沿海各州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①，建议修复捍海堤。张纶也是个实干家，十分赞同范仲淹的意见，立即奏请朝廷任命范仲淹为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可是，还未动工，就有许多人反对说：“修堤能挡住堤外的海潮，却不利于排除堤内的积

① 北宋设发运使负责漕运江淮等六路的粮食以供应汴京。发运使往往也兼管茶、盐等课税的收入，有时称制置发运使。

水,不是划不来吗?”张纶坚决地回答:“海涛造成的灾害有九分,而堤内积水造成的灾害只有一分,利多弊少,为什么不值得干?”在张纶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始动工修堤。不料刚开工不久就碰上大雨雪,海潮骤然上涨,汹涌的浪涛冲垮了堤岸,顿时吞没了一百多个民夫。这一来,那些反对者可抓住了把柄,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淹死了几千人,海堤不能修了。”消息传到中央,朝廷派人下来检查,工程大有停罢之势。由于范仲淹、张纶一再力陈修堤的好处,



范仲淹率领民工修复捍海堤

才又获得批准，使工程没有半途而废。

在范仲淹和张纶的先后督促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二千六百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政府的田赋、盐课也大为增加。为了纪念范仲淹和张纶的功绩，当地人民为他俩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叫做“范公堤”。

过了六年，范仲淹又在苏州主持了另一项大的水利工程。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当时，范仲淹刚调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焦急。通过调查，他了解到，苏州地势低下，常发生涝灾，过去积水靠排入太湖，太湖再通过周围的河渠，将水排入西北的扬子江或通过东南的松江导入大海。但是，由于这些河道长期没有疏浚，多被淤泥堵塞，不能分解水势。太湖要承纳数郡之水，却只有松江一处能排流，所以一到多雨之时，就出现了湖溢（满）江壅（堵塞）、大水泛滥成灾的问题。摸清情况后，范仲淹立即上书朝廷，提出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的计划。得到批准后，他亲临现场，

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都是全国著名的水稻产地，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有七百万石之多，素有国家粮仓的称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东南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范仲淹就是这样，每到一地都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这在当时暮气沉沉、安于享乐的官僚集团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名声渐渐传扬开了。早在天圣六年（1028年）他的才干就受到宰相王曾、副丞相晏殊的赞赏，晏殊荐举他进京任秘阁校理^①。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反复的斗争。

当初宋真宗死时，继位的仁宗年纪还小，由他母亲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仁宗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独揽大权，把皇帝当成傀儡，满朝文武畏于权势，谁也不敢说话。范仲淹却挺身而出，上书批评这种现象。晏殊知道后大惊，忙把范仲淹找来，斥责道：“你这般狂妄好出风头，自己倒霉不说，连我这个荐举人也要受连累了。”看到晏殊怒容满面，范仲淹严肃地说：“我是您

^① 秘阁是宋朝政府保管图书典籍的机构，设有直学士、校理、检讨、校勘等官，负责图书的管理、编写、校勘等事。

推荐的，常常怕自己不称职而使您为我羞愧，万没想到会因忠直得罪您。”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谈了自己冒死直谏的理由。信中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二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踏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一番话，正气凛然，说得晏殊无言对答，只好谢罪。不久，范仲淹因奏请太后还政，触怒了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日不食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百姓没有饭吃，怎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好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一

部分赋税。为了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妃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份奢侈。范仲淹这样大胆地谏诤皇帝，震动了整个朝廷。当时北宋政权把持在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大官僚手中。他们玩弄权术，排斥异己，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既得禄位；只想保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更害怕别人批评，对范仲淹的耿直十分恼火。就在这年冬天，吕夷简利用后妃争宠的矛盾，怂恿仁宗废掉了对他不满意的郭皇后。范仲淹上书坚决反对，反被吕夷简借皇帝之手贬出了中央。直到两年后，由于他在苏州治水有功，授天章阁待制^①，才又被召回朝廷。范仲淹刚一回来，吕夷简就派人暗中警告他：“你现在的职务是侍从官，不是言官，用不着你多费口舌去议论国政。”范仲淹听出话中的用意，理直气壮地答道：“议论国事正是侍臣的职责，我怎敢不尽力呢！”吕夷简知道范仲淹不好对付，又想将他挤走。当时京城开封府是最复杂难治的地方，吕夷简故意派范仲淹去做开封知府，想用纷繁的事务缠

① 北宋设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这些馆阁分别设有学士、直学士、待制、校理、检讨、校勘等官职，通称馆阁之职。多以有学识能写文章的人充任，宋前期选择很严。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他们有机会参与谋议，纳谏诤，地位重要，升擢较快，一经此职，便成名流。故当时士大夫均以担任馆职为荣。

住他，使他无暇上书言事，并打算趁他稍有差错时立即罢免。没想到范仲淹一到开封，就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指开封）无事有希文。”吕夷简煞费苦心安排的诡计未能得逞，反而大大提高了范仲淹的声望。

范仲淹看到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私，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副百官图交给仁宗看，指明哪些人是按照规定升迁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对吕夷简任人唯亲，培植私党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吕夷简知道后，恼羞成怒，忿恨地对仁宗说：“范仲淹不是谏官，不该越职言事，他中伤我正是要挑拨我与陛下的关系，以便他交结朋党，蒙蔽陛下。”仁宗一向没有多大主见，听信吕夷简的谗言，将范仲淹降职贬至饶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这次遭贬，在朝廷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正直的官吏早就不满吕夷简堵塞言路，排斥异己的做法，一听说范仲淹又被罢黜，都非常愤慨，集贤院校理余

靖立即上书说：“范仲淹指责宰相的过错，有什么错？朝廷三次罢免这样敢于直言的人，今后谁还敢再说话？望陛下收回成命。”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也相继为范仲淹鸣不平，并激烈地抨击吕夷简一伙，一时间，朝廷上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派。吕夷简看到这些下级官吏也敢公开责骂自己，更加火冒三丈，他怂恿仁宗把余靖、尹洙、欧阳修都指为朋党，一起贬出了朝廷。这还不算，又在朝堂上贴出榜文，禁止百官越职言事，公开压制舆论。这就是北宋史上的“范吕党争”，宋朝的党争也就是从这时开端的。这种党争是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但是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官吏反对大官僚集团因循守旧的腐败统治，主张选贤任能、安抚人民、革新政治，这在客观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得到人民的同情和部分封建士大夫的拥护。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外贬时，同僚们又来为他饯行，鼓励他说：“此行愈光（更加光荣）。”第三次被贬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

景祐三年深秋，范仲淹乘船去饶州上任。瑟瑟秋风卷起片片黄叶，飘落在船舷上。入仕以来，他在大官僚

大权贵的压抑打击下，几起几落，前途充满了坎坷，如今虽已年过半百，但他壮心未已，仍旧勇往直前，要把满腔热忱报效给国家。

三、抵御西夏的帅才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hào}号]建国称帝的消息犹如寒冬腊月响了一声闷雷，震撼了宋朝朝廷。

党项族源出于我国古代的羌族，八世纪初从青海迁徙到今甘肃和陕北河套地区。其中住在夏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西)的一个强悍的党项族部落叫做平夏部，它的酋长拓跋思恭因为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唐朝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五代时期，拓跋思恭的后裔继续统治着银、夏、宥、绥、静五州(相当陕北无定河流域到盐池一带)。北宋统一后，宋太宗打算利用党项贵族内部的矛盾消灭这支地方势力，结果引起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部落的反抗。双方交战二十多年，宋朝不仅未能占领银、夏五州，反而失掉了西北重镇灵州(治所在今甘肃灵武西南)。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为了集中力量向西发展，与宋议和。接受了宋朝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封号，以向宋称臣换取了宋朝送给银、绢、茶叶和恢复边界贸易

的经济利益。随后李德明积极向西扩张,从回鹘手中夺得河西走廊最富饶的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经过三十来年的经营,西夏渐渐强盛起来。

明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病死,他的儿子元昊继立为西平王。李元昊身材魁梧,宽圆脸,高鼻梁,眉宇间透着一股剽悍傲慢的气质。他自幼读书习武,不仅善绘画,懂佛经,通番、汉文字,而且娴于骑射,还在青年时期便已策马挽弓带兵打败了回鹘。凭着这一身本领,元昊早就雄心勃勃地想成就一番大业,曾屡次劝其父不要对宋称臣,德明见他如此,告诫说:“我们党项人过去久战疲困,这三十年来所穿的锦绮都是宋朝所赐,不可忘恩负义。”元昊轻蔑地答道:“穿皮毛衣服,从事畜牧,这本是我们党项人的习俗,英雄出世就得干一番王霸事业,要锦绮做什么?”

元昊继位不久,就挥师攻占了瓜州、沙州、肃州(今甘肃安西、敦煌、酒泉一带),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到这时,他统治的区域已经迅速扩大。但是元昊并不满足,还想东进侵宋,他加紧搜罗宋朝的失意士人作为谋士,设百官,建兵制,兴学校,经常派人刺探宋朝情报,窥测山川道路,并且把国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一切准备就绪,元昊就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意味着宣告中止对宋的臣属关系。宋

朝闻讯后于次年下诏削除元昊官爵，断绝贸易。一时间，西北地区战云密布，一场冲突爆发了。

西夏的突然挑衅，使宋朝措手不及，朝廷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多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就气喘流汗，骑兵中有的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所以当时人评论：“以屡易（经常调换）之将，驭（指挥）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①

1039年夏军已进犯宋之边境，到了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又率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个志短才疏的胆小鬼。他一听说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谁知元昊早已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眼看延州就要失守，范雍束手无策，只会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来，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城才未陷落。但是延

^① 见《宋史》卷285《贾昌朝传》。

州以北的三十六个寨堡却都被夏军荡平了，东西四百里屏障一扫而光，延州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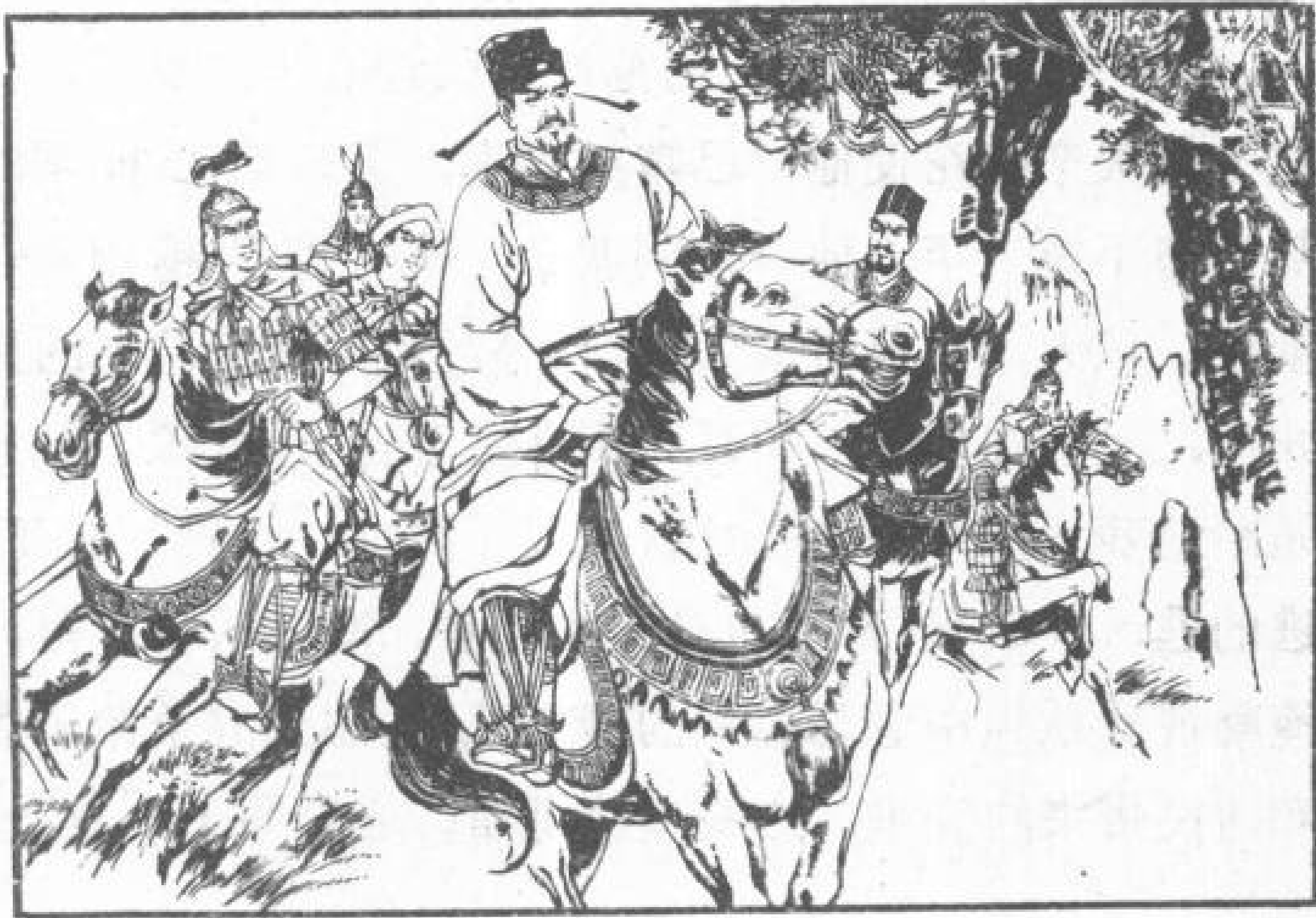
三川口的惨败，使仁宗大为恼怒，他一气之下贬了范雍的官，并一再更换陕西方面的统帅，但都不得力。这年五月，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为了加强军事指挥的力量，七月又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①，韩琦负责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这时的范仲淹已经五十二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他一接到调令，就立即从越州奔赴前线。秋天，当范仲淹风尘仆仆赶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副非常荒凉的景象。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苟延时日。范仲淹凝视着秋风中瑟瑟摇曳的野蒿荒草，想到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灾难，心头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

^① 宋朝在沿边各路设有经略安抚使，主持一路之军政和民政。有战事则加招讨使，为一路的主帅，副使相当副帅。

未勒归无计^①。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当时，摆在范仲淹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残局。但是，最令他忧虑的倒不是环境艰险，而是宋朝到这种时候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抵御方略。一连数日，他马不停蹄地视察鄜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



范仲淹在陕西前线观察地形，访问将士。

① 燕然，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公元89年东汉窦宪击破匈奴北单于后，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范仲淹说燕然未勒指尚未战胜西夏，不能回家。

方针。范仲淹反复权衡着宋夏双方的实力对比：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夏军人数较少，但人擅骑射，兵精马劲，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又多沙漠，其都城远在黄河以北，倚远而险，不易攻取。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的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是十分冒险的。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卒；对外坚壁清野，不与大战，夏军大攻，就闭垒以待隙，小攻，则扼险以制胜；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二、三年后，西夏自会困弱下去，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想到这里，一个完整的战略方案在范仲淹头脑中酝酿成熟了，他忙提笔写好奏章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就连与范仲淹私交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在战略上，韩琦坚决主张进攻，他上表说：“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这么怯弱，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都要丧失光了。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他要求集中各路兵力入讨，速战速决。两种主张报到中央后，急于求成的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

张，命令韩琦和范仲淹同时出兵。范仲淹感到这样做太冒险，连上三表反对，但都无效。他只好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淹出兵，范仲淹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坚持己见，不禁叹息道：“范公这就不如韩公了，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一听，立即反驳说：“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我不敢苟同。”韩琦得知劝不动范仲淹，便贸然决定泾原一路自行出讨。他调集了镇戎军的全部人马，又临时招募了一万八千壮士，全交给副将任福率领。出兵后，任福及诸将轻敌贪功，被一小股佯装败退的夏兵引诱，脱离了原定的行军路线深入追击，当人困马乏的大军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突然鼓角声大作，伏兵四起，宋军陷入了元昊的埋伏圈内，经过一场血战，任福等诸将战死，阵亡的士卒达六千余人。韩琦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回来，刚走到半路，只见数千名阵亡兵士的父兄妻子，手里捧着死者的旧衣，提着纸钱，拥到韩琦马前大哭道：“昨天你跟着招讨使(指韩琦)出师，现在招讨使回来了，而你却死了，你的魂魄能跟招讨使回来吗？”哀哭声震动了山野。见此情景，韩琦满面惭色地勒住马，也不禁潸然泪下。范仲淹听到败讯，叹息道：“这时

就难以置胜败于度外了。”

好水川的惨败，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上主张速战速决的人，仁宗也放弃了进攻的方针，改而采取守策。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淹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等相应的措施。

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淹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范仲淹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一百五十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种世衡又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民练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在范仲淹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复了永平、承平等旧寨十二处；招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开辟营田数千顷，恢复了农业生产。这些寨堡有力地屏障了延州，使延州的防务稳固下来。夏军私相告诫说：“别想打延

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象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朝调整了兵力部署，罢了主帅夏竦等，将西北前线划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分别置帅。范仲淹负责环庆路的军事。一年以后，韩琦、范仲淹被提升为陕西沿边的总帅，统一指挥四路军事，范仲淹的主张得以全面推行，延州筑寨的经验被推广到各路。当时宋夏接界处，被夏军占据的地段，有的伸入宋境百余里，隔断了州与州之间的联系，不便互相接应。范仲淹主张选择这些地区作为进攻的重点，攻取一地，即建一城，派兵驻守。稳扎稳打地逐步向前推进。没有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一方有警，各方应援，便于调集兵力抵御夏的进攻。沿边寨堡的修建，在各路的北面竖起一排排屏障，有效地加强了宋军的防守能力。

精练士卒，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一是大力整顿现有军队，淘汰老弱，选择强悍武勇的士卒，重新编制，指定专人负责统率和训练，改变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其中特别是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这对士气的鼓舞很大。再则是招募土兵，提高军队的素

质。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戍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的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士兵的增设，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韩琦等赏罚严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做的结果，使人心悦诚服，将士思战。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在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着不少羌族部落，他们在宋、夏间持观望态度，有的曾投靠西夏，为元昊作过向导。范仲淹一方面筑堡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并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极意招抚他们，羌族酋长来见，范仲淹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卧内，推心置腹相谈。对受到战争损害的羌族人民则拨给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一政策受到羌族人民的拥护，他们亲热地把范仲淹叫做“龙图老子”（当时范仲淹

的职衔是龙图阁直学士),羌族部落纷纷归附宋朝,担任响导,并出兵助战,使西夏日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元昊几次进攻,非但得不到什么战果,反而损兵折将,夏军锐气大减,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范仲淹居边不过三年,在西北人民的支持下,由于推行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防守措施,迅速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指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羌民亲热地唤他“龙图老子”

长期的战争和经济封锁大大损耗了西夏的力量，使其境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匹绢价竟高达八、九千钱，加上国内又发生了鼠食庄稼和旱灾，粮食更为紧张，老百姓怨声载道，元昊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北宋由于财政困难也难以长期支持，双方都想及早结束战争。于是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元昊继续对宋称臣；宋朝则恢复互市贸易，每年还“赐”给夏国岁币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至此，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四、一次刷新政治的尝试

庆历三年四月，雁飞塞北，春回边寨。宋夏局势刚刚和缓，范仲淹和韩琦便匆匆告别西北前线，奉调回京了。对于这次调动，宋仁宗是有其用意的。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代皇帝，传到他手上的这份“祖业”，已经经营了八十年，不但没有富强起来，反倒出现了危险的征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北宋政权是在军阀长期混战割据后创建的。为了防止分裂的悲剧重演，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上台，就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方面竭力削弱武将兵权，另一方面尽量扶植文官势力，优待文士。这种政策给官

僚机构带来很大影响。在宋朝，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最初，每次开科取士至多不过三十人，到宋太宗时，为了笼络文士，换取地主阶级对皇权的支持，录取名额不断放宽，进士与诸科录取多达一千人，这就为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敞开了大门。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府，使官员越来越多。另一作官途径就是通过“恩荫”（皇帝对大臣或功臣的子孙赐予官职），也叫“任子”。这种制度，虽然汉唐以来就有，但是宋朝恩荫之滥却是前所未有的。皇帝登基、过生日有荫；三年一次的祭天典礼有荫；甚至皇帝结婚、生孩子也有荫。官僚级别越高，能恩荫的人就越多，一个二品宰相，不但子孙亲戚，连他的门客、私人医生都能沾光捞到官职。除了这些法定的恩荫外，对退休的、上遗表（官吏在临死前写给皇帝的表章）的官吏或前朝元老还有五花八门的“加荫”。因此在大官僚的家里，无论是玩竹马的孩童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都早已准备好官服了，以致官僚机构中塞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

这样一来，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却越来越低。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员有一万多人，到了仁宗时，官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共两万多人。所有这些官员都享受优厚的俸禄，例如：一个宰相或枢密使（主持全国军政的长官），月俸就有三百贯（每贯一千

文),月钱之外,还发给春冬服装和茶酒厨料等物,几十名随身仆人的衣食也由政府供给。正俸之外,还有各种“恩赏”,动不动就赐给大臣银数千两,多的达万两。所有这些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因此后人批评宋朝是“恩逮(加给)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与此同时,军队数量也不断增加。宋朝为了防止农民造反,每逢荒年就在成千上万的饥民中招募强壮者为兵,使吃军粮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承平日久,军队流于骄惰,战斗力极差,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和应付边境上辽、夏的侵扰,不得不一再扩充兵员。宋初,靠二十二万军队就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这时,军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前线还是不断吃败仗。结果军队也和官僚机构一样膨胀起来。当时养一名士兵,一年要一百贯钱,全国一年的养兵费就多达一万万贯以上,成为最沉重的一笔财政负担。

官多、兵多,财政支出已经很大,皇室还大兴土木,建宫殿,筑寺观,任意挥霍浪费,因此到仁宗时,财政支出开始入不敷出了。史书上把北宋的这种弊病称之为“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的负担都以沉重的赋税摊派到劳动人民头上,官僚不但享有免役权,而且隐田漏税,肆意兼并土地,霸占民田,逼得广大农民典妻卖子,倾家荡产,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仁宗上台后,农民

起义一年多似一年，反抗斗争不绝，内忧外患同时爆发。不少有远见的地主士大夫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仁宗进行改革。宋仁宗也害怕江山坐不稳，急忙下诏把一贯主张改革的范仲淹从西北召回来进行商议。范仲淹回到朝廷不久就被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此时的仁宗急于扭转危机，三番五次地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这时已重返朝廷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余靖和名士石介等人也大力支持范仲淹。这一切更增加了范仲淹改革的信念，他对富弼说：“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我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于是，他又投入了一场比抵御西夏更为艰巨复杂的战斗。

盛夏的开封，闷热异常，政事堂像蒸笼一般，范仲淹却伏案疾书，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想法一齐涌到笔端，他很快就写成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黜是降职或罢免，陟是升官）。那时，升降官吏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结果那些敢于兴利除害的人反被指为惹事生非，受到嫉妒、嘲讽、挤陷，而饱食俸禄、无所作为的人，却可以

坐至公卿。像这样贤愚不分，是非不明，只能鼓励因循苟且的作风，导致百事废毁，政治腐败。因此必须严格考核现任官吏，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撤换有罪的和不胜任的官员。

（二）抑侥幸。范仲淹说：“现在的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刻剥百姓，使生民受弊。”应该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四）择长官。他说：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的官吏，不胜任者十居八九。有的懦弱无能，放纵猾吏豪民压榨百姓；有的年老有病，升官无望，就接受贿赂，专为子孙打算；有的少壮强干，又不愿留在州县，对政事马马虎虎，专门干些沽名钓誉、逢迎上司的事，以求升迁。应该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吏，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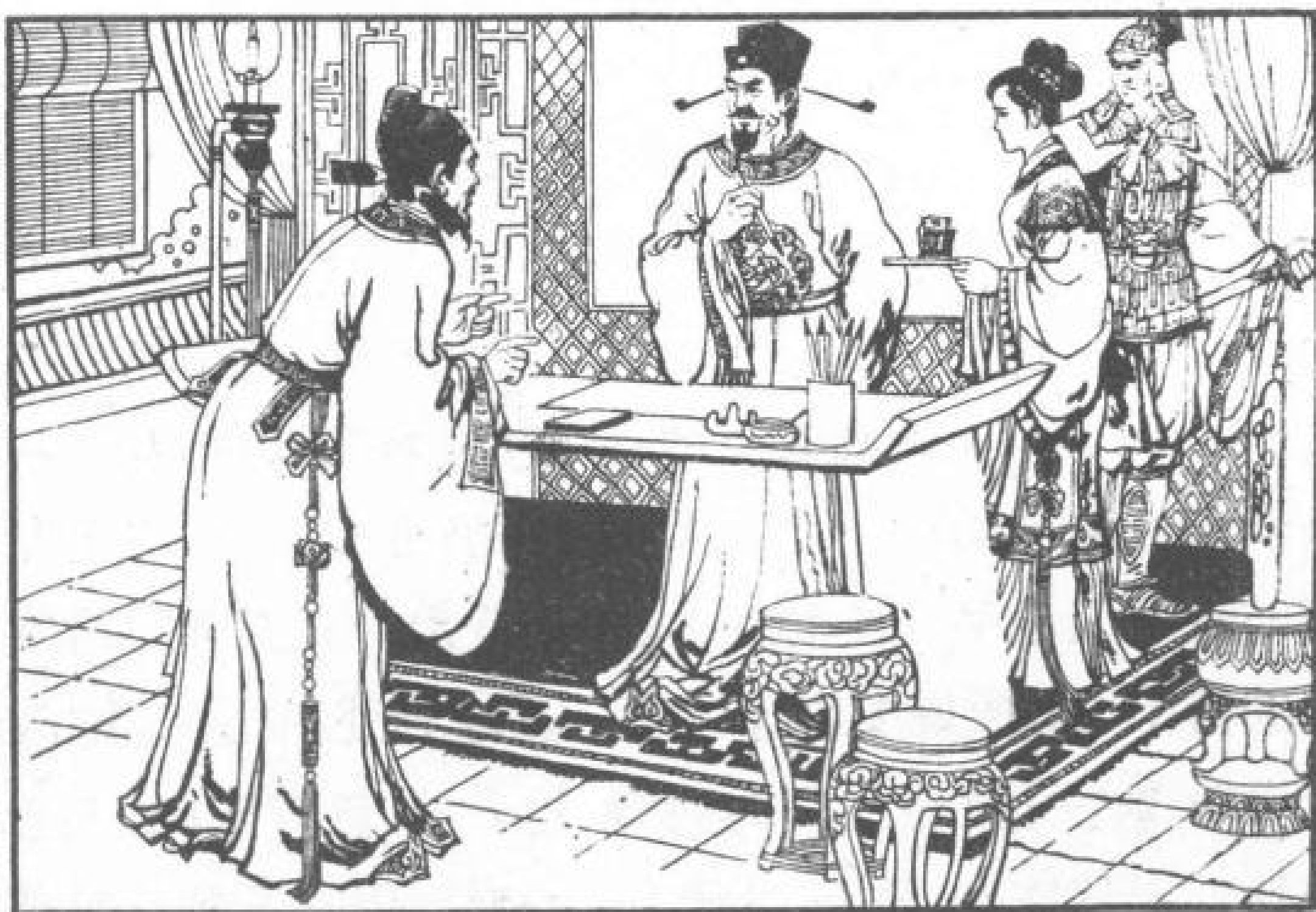
(五) 均公田。公田指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吏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应改变这种不均的状况,确保低级官吏的合法收入,以免这些人因生活困窘而贪赃枉法。

除了上述五条外,范仲淹还提出了“厚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修武备”(在京城附近召募卫士,寓兵于农);“减徭役”(减轻人民差役负担)和“推恩信”、“重命令”(使赦免罪犯、免除欠税的命令真正兑现,以取信于民)等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仁宗。仁宗表示赞同并用诏令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吏,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只领俸钱不务公事、终日游娱宴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中



“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

小官吏被提拔到要职上，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都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吏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好景不长，在新政的热烈场面背后，一股潜伏的黑暗势力正集结力量向革新派扑来。由于这次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群起攻击新政，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了宦官，在仁宗面前不断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昏庸的仁宗知道范仲淹在封建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名望，又掌

过西北兵权，渐渐对他猜忌起来。守旧派利用仁宗对革新派的疑心，更加紧了政治陷害活动。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怀恨在心，蓄意要加以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与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里面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一时间，朝廷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对这件事，仁宗虽然未必全信，但是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到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见大势已去，改革很难再推行，正好这时西北又传来警报，他便申请前往巡视，以河东陕西宣抚使^①的名义重返西北前线。枢密院副使富弼也以河北宣抚使的名义离开了京城。这时朝廷上的守旧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他们造谣中伤，扬言要把革新派一网打尽。在这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挟持下，一年前还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完全退缩了。庆历五年初，他下诏废弃一

① 宣抚使是代表宋朝中央政府前往抚绥边境、指挥监督前方军事的，是一种临时的职务，常以中央执政大臣担任，地位高于安抚使。

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则被贬至郢州（今山东东平），欧阳修、余靖、蔡襄、韩琦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了。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所领导的一次革新运动。他企图通过改革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限制权势子弟占据要职，淘汰一批贪污腐化官僚，从一般地主知识分子中选拔有能力的人才来充实政府，以达到刷新政治缓和人民不满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次改革对于冗兵、冗费以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这类严重的军政、财政和社会经济问题，都没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它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要差得多。而且这一改革在守旧势力的打击下，为时甚短，也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它就象往一潭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大石头，激起一层浪花，翻腾一阵后又复归平静。但是，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为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五、“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

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

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①

这是范仲淹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寄赠友人的一首诗中的几句，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飞鸟，对待生活只要求有一个足以栖身的巢就够了，并不贪图富贵，但假若不能使天下人得到安乐，他自己也就无法安静。这就是他感到不幸的来源吧！这首诗揭示了范仲淹高尚的思想境界。

早在青年时期，范仲淹就喜欢研读儒家经典，儒学中宣扬的忠孝、仁义、崇尚名节等政治伦理思想对他的熏陶很深，他十分向往古代志士仁人忠君爱民、为国捐躯的精神，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这种思想感情时常在他的诗词文章中流露出来。范仲淹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北宋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出色，虽然流传下来

① 禀：天生的性格。仞：八尺为一仞，千仞形容极高处。

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那篇文笔优美、哲理深刻的散文《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这篇文章原是为劝勉滕宗谅而作的，它也象一面明镜，反映出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的情操。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为人一向豪爽刚直，办事也很有能力。他在陕西和范仲淹一起抵御西夏时，由于被朝廷一些小人所妒嫉，诬告他贪污浪费军款，结果被贬往岳州（今湖南岳阳）。滕宗谅受黜后，心情很郁闷，范仲淹总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庆历六年（1046年）春，滕宗谅重修的岳阳楼竣工了。他写信给范仲淹请求为岳阳楼作一篇记。当时庆历改革刚失败不久，范仲淹在政治上遭到很大的打击，被贬在邓州，身体也很不好。但是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他一口答应了滕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以国家前途为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为国家大事忧虑，这样“进亦忧，退亦忧”，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范仲淹豪迈地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理想。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表达了他

那宽阔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千百年来使读者从中受到鞭策和鼓舞，因而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励的著名格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

范仲淹不但在文学上有成就，而且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教育家。他常说：“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只有办好了学校，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他多次建议朝廷要“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他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地，除政事之外，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办学事业上。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他为母亲守丧住在应天府时，晏殊请他去掌管府学，范仲淹欣然



在花洲书院挥笔写《岳阳楼记》

前往。他常常住在府学中，勤劳恭谨，以身作则。对学生管教很严格，也很得法。每次出题作文，自己先要作一遍，以便掌握题目的难易程度，并使学生有所取法。府学办得很有成绩，慕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景祐二年(1035年)，他在苏州任地方官，苏州是他的故乡，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一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范仲淹在地方上从政三十多年，无论是在交通发达的润州、饶州，还是地处边陲的邠州(今陕西彬县)，他都尽力提倡教育事业，兴办学校。这些教育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州郡办学的风气。庆历四年，在范仲淹建议下，仁宗曾下诏在全国州郡建立学校，岁贡群士。当时地方兴学适应了一般中小地主送子弟读书应举的需要，所以在范仲淹的倡导和努力下，庆历年间，北宋的地方学校象雨后春笋一样普遍出现了。

正由于范仲淹把“育天下之才”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他对一些有为青年非常爱惜和关心。他在

应天府讲学时，学生中有一个叫孙复的青年，聪敏好学，很有培养前途，但他因家中贫寒，老母无人供养，不得不中途退学，去奔走生计。范仲淹知道后，马上拿出自己的钱资助他，又设法帮助孙复在府学中找了一个差事，每月可以得到三千文养家费。从此，孙复白天供职，晚上听范仲淹讲解《春秋》经义。他常常通宵苦读，不忍释卷，十年后终于成为北宋有名的专长研究《春秋》的儒学大师。范仲淹在西北任统帅时，手下有一位将领叫狄青，作战很勇猛，为人也十分豁达开朗。范仲淹很喜爱这员虎将，他把《左氏春秋》这部书送给狄青，对他说：“熟读史书可以增长智谋、推断大事，武将如果不通今博古，就只有匹夫之勇。”狄青在范仲淹帮助下，读了许多秦汉以来的兵书、史书，对古代兵法很有研究，成为有勇有谋的良将。

此外，如名臣富弼、学者胡瑗、张载、李觏等也都受过他的指教和有益的帮助，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宋代的名人，在政治文化方面多做出过贡献，其余因他的推荐而得以发挥作用的人就更多了。

由于范仲淹的道德、风格和学问受到人们的仰慕，“天下想闻其风采，贤士大夫以不获登其门为耻，下至里巷，远及夷狄，皆知其名字”。^①他带头提倡气节，对转变

^① 见曾巩《隆平集》卷八。

北宋的士风有很大的影响。

范仲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有一句名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就是说，一个官吏在政治上要敢于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但对于个人操守，就应务求无过。他作官以来，十分廉洁，从不置办家产，看到周围人生活有困难，常常解囊相助。即使做到了副宰相，家庭生活依然很俭朴，没有宾客登门，平日都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求温饱。范仲淹治家很严，不许子女享受奢华的生活。二儿子结婚时，他听说未过门的儿媳用罗绮缝制帐子，心里十分不高兴，对妻子李氏说：“做帐子怎么用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家一向清俭，不能败坏我的家风。她如果敢带这样的东西过门，我就把它当众烧掉。”范仲淹始终保持着这种朴素的作风，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建造过一所象样的宅第；在他死后入殓的时候，连件新衣都没有。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自青州(今山东益都)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在徐州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临死，在给朝廷的遗表中仍然丝毫未提个人的要求，再次显示了一心为公的胸襟气度。范仲淹的这种精神和政绩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在他死的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西北庆州羌民听到他的死讯，

数百人来到祠堂痛哭哀悼，斋戒三天才离开。

范仲淹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并为实现这个宏愿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在他同反动腐朽力量的斗争中，“不畏权幸，不蹙忧患”，^①百折不挠，对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始终抱有坚强的信念，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已成为我国宝贵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至今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① 见《范文正公集》末附《褒贤集》富弼撰《墓志铭》。